

第一部分 地理语言学基础研究

1 地理语言学概述

1.1 地理语言学的性质

地理语言学(geographical linguistics),是跟地理学结合的语言学,是把不同地点的同一语言事实的表现描绘在地图上,然后进行解释的语言学。从地理学角度来说,地理语言学叫做语言地理学(linguistic geography),语言学领域以前一般也用这个名称。地理语言学用不同地点的同一语言事实的表现做基础,利用地图的方式描述语言现象在地理空间上的分布状况,结合地理、历史和社会因素解释这些分布形成的原因,探索语言现实分布和历史变化的规律。(曹志耘,2002A)地理语言学的核心特点就是用语言特征地图的方式研究语言。

“地理语言学”是索绪尔(1982:13)《普通语言学教程》第4个部分的标题。但是目前多数人习惯叫做“语言地理学”或者“方言地理学”(袁家骅等,1983:12)。因为它作为语言学领域的术语,应该是运用地理科学方法和成果研究语言的科学,属于语言学,所以,我们建议仿照“历史语言学”、“共时语言学”、“结构主义语言学”等术语,叫做“地理语言学”。否则,把“语言地理学”放在现代语言学分支类型的术语中,显得不协调,好像它是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在《人文地理学》(王恩泉等,2000)中就把“语言地理”当做跟“政治地理”、“旅游地理”、“宗教地理”等并列的地理类型。

在中国语言学领域,“地理语言学”逐渐在名称上取代“语言地理学”。在中国的学科设置目录里,目前一般还是在“语言学”下设置“方言地理学”或者“语言地理学”。这是因为中国的地理语言学基本上是受到日本地理语言学影响发展的。日本早期的地理语言学著作柴田武的《言语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1969年出版)就是用“言语地理学”的名称,这个名称一直被后来学者沿用。20多年后,日本学者岩田礼《汉语方言“祖父”“外祖父”称谓

的地理分布》在《中国语文》1995年第3期发表,文章的副标题《方言地理学在历史语言学研究中的作用》里用的还是“方言地理学”。2010年首届“中国地理语言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语言大学召开,标志着“地理语言学”这个名称在中国正式成为语言学学科名称。这在理据上比原来的“语言地理学”或者“方言地理学”更加像语言学名称,而不容易使人产生它是地理学名称的错觉。

研究特定通用语言的结构等,属于个别语言学;研究不同语言特别是非通用语言或者方言之间的关系和共性,属于一般语言学;研究语言的特定方言的结构等,属于特殊的个别语言学,也叫做方言学。虽然在中国地理语言学一般跟方言学密切相关,但是地理语言学和历史语言学是分别首先从空间和时间两个角度对语言进行研究的科学,它们都属于一般语言学。正如时间和空间总是联系在一起,而且空间上的差异导致时间上演变速度的差异,历史语言学和地理语言学也总是联系在一起。相对来说,历史语言学由于19世纪的历史比较语言学时期研究成果很突出,所以显得比地理语言学更加成熟。

如果说历史语言学是一种时间语言学,那么地理语言学就是一种空间语言学。地理语言学纠正了历史语言学过分重视历史材料的偏向,弥补了历史材料缺乏的局限,加强了对活语言或者口语的重视和利用。应该说“共时语言学”,就是研究语言空间的,但是,它一般局限在特定时间和特定空间抽象出来的单一系统的解剖,或者几个这样的现代单一系统的比较。所以我们不仅要看到“历史语言学”和“共时语言学”的对立统一关系,而且要看到“历史语言学”和“地理语言学”的对立统一关系。

给语言或者方言做历史关系分类,实际上也是在对它们进行一定程度的空间关系的分类,因为共同的空间分布关系往往有共同的时间变异关系。但是它们又往往出现不少例外。例如印度在亚洲,却跟欧洲许多语言有密切关系。衡山其实在湘语包围中,古代全浊声母的变化却既不像湘语也不像与湖南有历史移民关系的赣语,却像覆盖在湖南南部“土话”方言上面构成双方言格局的西南官话,好像是官话率先渗入湘语核心区域形成的方言岛。

如果不分主次关系地从时间和空间关系得出一个综合类型,那会带来许多交叉重叠的麻烦,实际上没有严格区分开来。例如,“是否保存浊音”就是一个不一定可靠的标准,因为一方面,浊音分成音位性和音素性两种;另一方面,浊音是一个不稳定音素。

“是否浊音”,对于汉语的很多方言来说不是音位性特征;相反,“是否送气”是汉语方言共同的音位性特征。所以,虽然从衡山的后山话来看,这两

个特征都有音位性,可以用来跟前山话区分,但是放在湖南甚至更大范围内考察,就只有“是否送气”这个普遍特征的发展差异才具有比较价值。

如果根据一定特征,把方言分成不同区域,然后对不同方言进行内部比较,就可能是画地为牢,会忽视相同行政管理空间的不同方言的相互关系。只有首先从地理语言学角度,不管方言类型,用地图表现相同语言单位的各种事实,才能发现更多的实质关系。

从长沙话演变的历史记录(鲍厚星,2002)可见,无论前后鼻音的混淆还是前后舌尖元音的混淆,都说明在语言消磨过程中,它们在逐渐走向简化,偏僻或者人口稳定地区比发达或者人口不稳定地区变化慢。

所以,无论从远离长沙市区的湘潭、衡山,还是从接近市区的长沙市郊区的空间变化事实,都可以帮助我们深入认识汉语方言的历史变化。这是弥补汉语缺乏系统细致的历史记录这个遗憾的重要途径。当然,“方言地图只能推测各种形式的新旧关系,也就是说相对年代。要确定一个词产生的绝对年代,我们还需要把方言地图和文献资料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岩田礼,1995)

地理语言学跟一般的语言或者方言调查不同。它不是针对一个地点做全面的分析,而是要针对比较多的地点精选尽量少的调查项目进行调查。因为地点多了,如果项目还多,不仅无法胜任浩大的调查工程,而且会没有重点,浪费资源。

地理语言学在中国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因为中国地域广大,语言种类多样,方言特别是汉语方言覆盖全国,复杂多样,是地理语言学的沃土。(曹志耘,2002A)外国学者贺登崧把地理语言学介绍到中国以后又介绍到日本。但是地理语言学包括研究中国汉语的地理语言学都是在日本先成熟,中国在后面才开始发展的。因此,中国人自己研究自己的语言的地理语言学应该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1.2 地理语言学的类型

一般的汉语方言研究跟地理语言学有密切关系。但是方言地图有两种,也体现出地理语言学的两种方法:第一,特征地理研究。它是根据一定特征对方言材料地点进行分类,例如《苏州方言地图集》。第二,分区地理研究。它是根据重要特征对一定连续空间进行区域分割,例如《中国语言地图集》。

广义的地理语言学包括上面两种研究。狭义的地理语言学是指特征地

理研究。

在中国地理语言学理论方面,项梦冰、曹晖的《汉语方言地理学——入门与实践》(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虽然不是很成熟,狭义的地理语言学性质不突出,但是可以说是中国第一本地理语言学教材,涵盖了特征地理和分区地理两个角度的研究。

2003年湖南师范大学彭泽润的博士论文《衡山南岳方言的地理研究》,是在高密度调查和绘制方言特征地图基础上做特征地理研究的最早成果。论文从微观角度针对一个县级行政范围的整个区域的350个行政村做了高密度的调查,绘制90幅地图,在分区的基础上,详细地描写了90个方言项目的超越分区界线的细微的地理分布情况,也使原来朦胧的分区,特别是其中的“夹山腔”区域得到清晰化。

2008年曹志耘主编的《汉语方言地图集》(商务印书馆)是最早针对全国的汉语方言做特征研究的著作。这部著作凝聚了全国同行的集体智慧,跟以前出版的主要体现分区地理成果的《中国语言地图集》形成互相补充的关系,完善了广义的地理语言学的研究领域。

总之,地理语言学有分区和分类的不同研究方法。对一个地点的语言或者方言内部系统做准确的描写和分析是地理语言学的基础。但是汉语方言研究从分类的地理语言学角度对一定特征进行高密度的地理空间研究的成果比较缺乏。像岩田礼一样不仅用地图分类,而且进行理论分析的成果更加少。虽然我们也需要全国范围轮廓性的地理语言学成果扩大眼界,但是要高密度研究汉语方言地理不能首先贪图全国范围,因为范围越大工作数量越大,无法细致。所以要从小范围打基础,“小片方言的方言地图或者地图集应当多多出版。”(陈章太等,2001)

1.3 地理语言学的历史

地理语言学是19世纪80年代在欧洲兴起的。1876~1881年德国语言学家文克尔(Georg Wenker)最早运用这种方法调查和绘制了有“同语线(同言线)”的6幅德国方言地图。以后,法国、意大利等国家都有了相关成果。例如法国在1902到1909年出版了《法国语言地图集》,涉及650个地点,2000个词语,由艾德蒙(Edmond Edmont)调查,吉叶龙(Jules Gilliéron)编制。“地理语言学”是索绪尔(1982:13)《普通语言学教程》第4个部分的标题,可见在19世纪末期地理语言学在语言学中的地位。(曹志耘,2002A)

在亚洲,日本的地理语言学发展比较早。最早从西方引进地理语言学研究方法的是上田万年。他早年在德国留学。1905~1906年出版《音韵调查报告》和《口语语法调查报告》,分别包含29张“音韵分布图”和37张“口语语法分布图”。这是日本第一个地理语言学成果,发现了日语在地域上呈现东西对立的分布特征。柳田国男在《蜗牛考》(1930年出版,1943年修订)认为地图上分布着“蜗牛”的各种词形,原因是历史上的中央地区逐渐向周边地区扩散的结果,阐明了语言时空变异的关系。柴田武《言语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1969年),使日本地理语言学走向成熟。柴田武、野元菊雄、上村幸雄、德川宗贤等1966~1974年出版《日本言语地图》,涉及2400个地点,300幅地图。从此,地理语言学在日本掀起高潮。(张勇生,2011)他们还走出国门,把中国的汉语方言作为研究地理语言学研究对象。

但是,在中国地理语言学的产生比欧洲晚了一百年,而且是先发展方言学,再发展地理语言学。虽然以前也有借助地图或者根据地名研究方言的成果,但是,真正的地理语言学意义的成果是在20世纪40年代才出现。20世纪80年代出现标志性成果《中国语言地图集》,不过这个成果还只是分区类型的地理研究。一直到了21世纪初期特征类型的地理语言学研究成果才不断出现,曹志耘主编的《汉语方言地图集》是特征地理语言学的标志性成果。

汉朝扬雄《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已经采用地名来分析汉语方言的地理差异。

真正采用地图来研究语言到20世纪初期才出现。1934年上海申报馆出版的《中华民国新地图》有一幅“语言区域图”,由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提供。这是中国第一幅语言分区地图,还不是语言特征地图。

这个时期外国学者对中国地理语言学特别是地理方言学做出了重要贡献。比利时学者贺登崧(W. Grootaers)(1911~1999)利用在中国传教的机会采用地理语言学方法研究汉语方言和民俗文化。他1943~1945年在《华裔学志》发表《中国语言学及民俗学之地理的研究》。贺登崧的汉语地理语言学成果集中在岩田礼等编译的《论中国方言地理学》(中国の方言地理学のために),(东京:好文出版,1994)。石汝杰(1997)发表《汉语方言地理学的优良教科书——评介贺登崧〈论中国方言地理学〉》介绍它,并且已经把它翻译成汉语出版,书名是《汉语方言地理学》(贺登崧,2003)。

这些研究中的地图都是方言特征地图。可以说,这是狭义的地理语言学在中国的萌芽。贺登崧是中国地理语言学的开拓者。

几乎同时,中国学者在进行方言调查的时候也附带做了地理语言学研究,绘制了面向方言分区的方言特征地图。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

究所赵元任等学者开展了一次全国性的方言调查,涉及广东和广西(1928~1929年)、陕西南部(1933年)、安徽南部(1934年)、江西和湖南(1935年)、湖北(1936年)、云南和四川(1940年)。其中一个重要成果是:赵元任等1936年调查1938年写作1948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湖北方言调查报告》。里面有66幅方言地图,是最早的汉语方言特征地图,属于典型的地理语言学成果。

类似《湖北方言调查报告》的调查结果后来带到台湾由杨时逢研究整理出版了云南(1969年)、湖南(1974年)和四川(1984年)3个省的汉语方言调查报告。分别绘制的方言地图有:云南65幅,湖南53幅,四川47幅。

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学者白涤洲1933年开始调查,他去世以后由喻世长整理在1954年由中国科学院出版的《关中方言调查报告》,有23幅地图,涉及陕西关中42个县级地点的材料。

中国学者王辅世是贺登崧的学生,在1949~1950年撰写了硕士论文《宣化方言地图》(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研究所出版,1994年),有34幅地图,涉及15个项目,64个地点。这是中国学者在外国导师的指导下做的第一个专门的地理语言学成果,全部是方言特征地图,而且用了很多篇幅对地图进行分析。

20世纪50年代,为了配合普通话推广进行了全国性的方言普查,不少调查研究成果中绘制了面向方言分区的方言特征地图。例如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调查指导组《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江苏人民出版社,1960年)有江苏和上海的方言地图有43幅。

中国学者丁声树、李荣等1959年开始调查,1960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昌黎方言志》,有地图12幅,涉及193个村级地点的方言特点。

叶祥苓《苏州方言地图集》(日本龙溪书社,1981年出版)是又一个专门的地理语言学研究成果,涉及的调查地点多到几百个。有51幅地图,涉及263个地点,地点覆盖了每个乡镇的主要村子。这些地图修订后收入叶祥苓《苏州方言志》(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这是到当时为止调查地理密度最大的特征地理调查成果,是典型的地理语言学成果。这个调查对一个县级行政区域进行调查选择的地点最多,虽然没有落实到每个村子,但是涉及了263个经过抽样选择的村子。当然这个成果对材料从理论角度进行比较和分析几乎没有。

在20世纪末期出版的方言成果中,地图丰富的首先是有里程碑意义的1987~1989年出版的《中国语言地图集》(中国社会科学院、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编写,香港:朗文出版(远东)有限公司,1987~1989年)。它用地图

的方式,根据重要特征进行概括以后对中国不同语言和汉语的不同方言进行了大致的空间划分,就是分区。这是中国第一部全国性的语言和汉语方言分区地图,是最重要的分区地理研究成果。

另外詹伯慧、张日升等研究广东珠江三角洲和广东西部方言,侯精一、温端政等研究山西方言,鲍明炜等研究江苏方言的成果,使用了不少面向方言分区的特征地图。主要的成果有:

詹伯慧、张日升主编《珠江三角洲方言综述》(包含 42 幅地图),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 年。

钱乃荣《当代吴语研究》(包含 50 幅地图,涉及 33 个地点),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 年。

侯精一、温端政主编《山西方言调查报告》(包含 50 幅地图),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3 年。

殷焕先主编《山东省志·方言志》(包含 25 幅地图),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 年。

詹伯慧、张日升主编《粤北十县市方言调查报告》(包含 45 幅地图),暨南大学出版社,1994 年。

陈章太、李行健主编《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包含 63 幅地图,涉及 93 个地点),语文出版社,1997 年。

詹伯慧、张日升主编《粤西十县市方言调查报告》(包含 68 幅地图),暨南大学出版社,1998 年。

鲍明炜主编的《江苏省志方言志》(包含 55 幅地图),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1998 年。

刘纶鑫主编《客赣方言比较研究》(包含 36 幅地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年。

钱曾怡主编《山东方言研究》(包含 24 幅地图),齐鲁书社,2001 年。

除了大集体协作研究以外,不少学者个人或者小集体也使用地图研究方言。例如,刘村汉在《方言》1985 年第 4 期发表《广西蒙山语言图说》,用了 6 幅地图。钱曾怡带领合作者多次使用这种研究方法发表成果(钱曾怡,2002 年)。1991 年钱曾怡、曹志耘和罗福滕在《方言》第 3 期合作发表论文,为了体现一个县内部的语音差异,对山东省平度县进行了 59 个地点的地理研究,画成 6 幅方言特征地图。

这个时期日本学者对汉语地理语言学研究很有贡献,而且他们纯粹从特征地理角度绘制地图和分析。例如,岩田礼《中国江苏、安徽、上海两省一市境内亲属称谓词的地理分布》(《开篇》单刊,东京:好文出版,1989 年)、

《汉语方言“祖父”“外祖父”称谓的地理分布》(《中国语文》1995年第3期),还有桥本万太郎的《语言地理类型学》(余志鸿翻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这时日本学者还在根据文献编制中国全国性的汉语方言特征地图。岩田礼等《汉语方言地图》(18个项目,24幅地图,280个地点),1992年在日本用“研究成果报告书”的形式出版。这是第一部涵盖整个汉语方言的特征地图集。

接着日本学者平田昌司等《汉语方言地图集》(38个项目,88幅地图,470个地点),1995年在日本用“研究成果报告书”的形式出版。远藤光晓等《汉语方言地图集》第3集(33个项目,97幅地图,650个地点),1999年在日本用“研究成果报告书”的形式出版。

日本学者松江崇《扬雄〈方言〉逐条地图集》,根据扬雄《方言》的资料绘制地图,1999年在日本用“研究成果报告书”的形式出版。这是第一部后人整理出来的古代汉语方言特征地图集。

进入21世纪后,地理语言学在中国逐渐成熟。2002年曹志耘《南部吴语语音研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本著作除了使用大量表格表现方言特征的空间差异,也使用了一些方言特征地图。

从落实到每个村子的高密度调查角度来说,彭泽润的《衡山南岳方言的地理研究》是第一本县级范围内的汉语方言特征地理研究的狭义的地理语言学著作。这是彭泽润自主选题后在鲍厚星指导下完成2003年答辩的湖南师范大学博士论文。这个成果中绘制了90幅地图,数据覆盖县内的全部354个行政村。这个成果也可以说是20世纪40年代贺登崧开创中国地理语言学以后,经过王辅世和叶祥苓发展以后,在21世纪产生的第一个地理语言学成果。

2004年,陈立中(2004)用2幅地图描述了湖南以及跟周边的广西、湖北、江西交界区域的浊音声母的分布情况,特别是影响它的地理条件,阐述了江西北部连接吴语和湘语的方言走廊。

以后地理语言学成果不断涌现。曹志耘指导了多篇北京语言大学答辩的地理语言学博士和硕士论文。其中博士论文例如2005年答辩的:王文胜的《处州方言的地理语言学研究》、郭凤岚的《宣化方言变异与变化研究》、唐伶的《永州南部土话语音研究》。

甘于恩指导了暨南大学2006年答辩的地理语言学硕士论文:蔡燕华的《中山粤方言的地理语言学研究》。

2006年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史浩元、石汝杰、顾黔的《江淮官话与吴语边界的方言地理学》,是一部研究方言边界的地理语言学的重要著作。这个调查采用词汇调查而不是语素(字)的调查方法。表格有两个:包含

439 个词的简要词汇表格;包含 1900 个词的详细词汇表格。词汇表格中基本覆盖了常用语素(字)。

具有标志性的地理语言学成果应该是曹志耘主编的《汉语方言地图集》(商务印书馆,2008 年)。这是第一部全国范围的汉语方言特征地理研究的狭义的地理语言学著作,也是中国语言学的标志性成果。

“汉语方言地图集”课题的调查研究 2001 年启动,2008 年完成,一共有来自 34 个单位的 57 位学者参加。调查地点一共是 930 个,遍及全国,东南部地区达到一县一地点的密度。除了省会级城市和方言区代表点城市以外,其余地点都调查乡下方言。发音人基本上是 1931~1945 年之间出生的男性。调查条目使用课题组专门编写的《汉语方言地图集调查手册》,涉及 1005 个条目,其中语素(字)425 个,词汇 470 个,语法 110 个。设立调查条目的主要原则是:(1)反映重要的地域差异,(2)反映重要的历史演变。所有数据一律到当地进行调查。在传统的书面记录之外,还采用数字录音方式录制全部调查项目的有声语料。所有调查材料经过录入、校对后,建成全部 930 个调查点的“汉语方言地图集数据库”。再利用 NFGIS 的全国地图数据和 ArcView9.1 绘图软件,建立“汉语方言地理信息系统”,在这个系统的基础上,进行方言地图的绘制工作。然后从全部调查条目中归纳出最有价值的 510 个地图条目,绘制成 510 幅方言特征分布地图,分为语音、词汇、语法 3 卷。各卷地图的类型及其数目是:(一)语音卷 205。(1)音类 160;(2)特字 32;音值 13。(二)词汇卷 203。(1)概念 188;(2)词形 6;(3)分合 4;(4)综合 5。(三)语法卷 102。(1)结构 51;(2)语法词 39;(3)综合 12。

2009 年鲍厚星又指导了两篇湖南师范大学答辩的地理语言学博士论文:孙益民的《湖南亲属称谓的地理语言学研究——以湘东北及湘东部分地区为立足点》,李永新的《湘江流域汉语方言地理学研究》。

2013 年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彭泽润、彭建国的《湖南方言》附录了 40 幅湖南方言词汇特征地图。

1.4 方言调查和方言学

方言学是和地理语言学密切相关的学科。它们都要涉及方言事实,但是又不同。地理语言学关注的是语言或者内部的方言的个别要素在地理上的分布和表现。方言学关注的是一种语言内部的局部地域的方言系统。

20 世纪以来,方言学(特指汉语方言学)和地理语言学(特指汉语方言

地理语言学)几乎同时引进现代西方语言理论开展研究。但是,方言学相对发展比较早比较有成就,地理语言学相对比较薄弱。因此,我们有必要在介绍地理语言学的时候,专门介绍方言学。

方言是一种语言在各个地方的具体表现。也可以说语言总是用方言的身份体现出来。正如几乎没有两个人的语言完全相同一样,几乎没有一种语言在不同地域完全相同。即使是高度统一的英语,在世界各地也产生五花八门的方言。当一种语言还没有被研究的时候,任何一个地点的具体表现都是方言。当我们确定一个地点的方言被自发或者自觉向其他地方推广,成为共同方言的时候,我们把这种方言叫做共同语,准确地说是民族共同语。这时这种语言在其他地方表现出来的系统差别就是方言。

引申以后,我们还把语言在特定行业或者社会领域产生的非系统差别叫做方言。这时,我们把地理上形成的系统差别叫做地域方言,把社会领域上形成的非系统差别叫做社会方言。

在中国古代,语言学主要的研究对象是几千年模仿用周朝到秦朝的语言制作的书面语“文言文”,这种被制作的书面共同语忽视或者轻视不断变化又分歧严重的口语事实。用口语方式存在的方言是没有正统地位的,只是日常生活的临时用品。即使是在地方戏剧中,角色的道白和唱腔也要把方言改造成词汇接近文言文的“雅言”,只有丑角插科打诨的时候才用地道的方言。

在现代中国,不仅北京方言被全国推广学习,而且人们从口语到书面语都基本上用这种经过规范的方言,我们把它叫做“普通话”,面对古代,叫做“现代汉语”,面对其他民族叫做“汉语”,面对外国人叫做“中国语”或者“中国话”。这是社会交往频繁和口语地位提高的时代要求。

研究方言的科学就叫做方言学。方言学就是研究民族共同语以外的民族语言的地域变体,在方法和地位上跟一般的语言研究没有什么不同。地理语言学虽然不能取代方言学,但是它们互相渗透,而且都需要做语言的田野调查。民族共同语都有大量的书面语事实,哪怕是长期脱离口语的“文言文”这样的书面共同语,都有人研究,因此不必白手起家。方言往往是没有书面文献可以利用的,还有很多方言是没有人研究过的,因此必须做语言田野调查或者方言调查。

方言调查跟一般的调查完全不同。一般调查可以利用大家熟悉的语言去表达,方言调查遇到的语音现象无法用大家通用的民族共同语完整记录。对于汉语方言,即使是汉语拼音也无法记录,因为汉语拼音是专门为汉语民族共同语普通话设计的。这样必须根据不同的方言采用不同的拼音,但是这样又难以互相沟通。于是,世界语言学家设计了国际音标,这样可以把世界各种语言及其方言可能出现的语音最小单位音素统一用相同的音标记录

下来。人们可以根据特定方言中记录的需要选择其中的音标。有人把英语选用的国际音标,当做汉语拼音,这是极大的误会。

1.5 汉语方言学的历史

到现在为止,中国的地理语言学只是方言学的部分内容,因此了解中国的地理语言学历史主要是了解方言学的历史。

古代时期,最早的汉语方言研究成果是汉朝扬雄的《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简称《方言》)。可见汉语的方言分歧一直存在,并且因此造成的交际困难一直被研究者关注。但是没有留下更多的方言研究的专门成果。

近代时期,清朝以后出现大量方言成果,例如李实(1598~1676)的《蜀语》,杭世骏(1696~1793)的《续方言》,等等。这些方言研究成果分词汇和语音两个领域。语音领域的成果主要是为了写诗歌押韵需要的韵书。

后来一些西方传教士为了方便向方言地区的人传播宗教,用自己发明的拉丁字母拼音方案记录各地方言,出版了南方各地的方言文献包括方言词典等。

现代时期,文学研究者促成了方言学的发展。1924年北京大学沈兼士提倡开展民间歌谣调查研究。他们需要通过方言调查获得资料,就成立了方言调查会,开始了现代方言调查。当时林语堂还在国际音标基础上设计了方言字母方案,但是他本人没有多少方言调查的成果。

赵元任等一大批语言学家对中国各地方言用国际音标等现代语言学方法进行调査,出版了《汉语字声实验录》(刘半农,1925年,法国巴黎大学博士论文;1924年在上海出版的时候叫做《四声实验录》)、《现代吴语的研究》(赵元任,科学出版社,1956年)等著作。

这个时期民间也出现为了诗歌押韵需要的工具书,记录了当时当地的方言事实,例如李旦冥的《湘音检字》(1937)记录了20世纪30年代长沙方言的事实。

1955年中国科学院(当时还没有分离出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丁声树、李荣在全国“现代汉语规范化学术会议”上做《汉语方言调查》的报告,拉开了全国方言普查的序幕,大学开设了方言学课程,出版了《昌黎方言志》(集体,科学出版社1960年)等著作和各地内部油印的方言普查报告。

从1956年开始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和教育部联合举办“普通话语音研究班”,学习普通话语音和汉语方言调查,培养了大批方言研究者。

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方言》杂志创办,拉开汉语方言深入研究的序幕。

2 语言地图和方言词典

语言地图主要体现成方言地图,特别是特征地图。方言地图是通过地图展示方言现象,主要特色是语言分布空间上的地理位置。方言词典是通过词典展示语言的基本单位词的信息,主要特色是语言结构单位的信息解释。

2.1 中国语言分区地图

《中国语言地图集》(中国社会科学院,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编写,香港:朗文出版(远东)有限公司,1987~1989年)的地图是彩色分区地图,分成3种:(1)综合地图,一共5幅,分析全国的语言和方言格局;(2)汉语方言分区地图,一共16幅;(3)少数民族语言分区地图,一共14幅。学者们从1979年开展工作,经历10年,调查涉及到600多个县级方言点。

它给汉语方言分区提出的层次系统。从小到大分成“点—小片—片—区—大区”的5个层次。“点”指方言点,《地图集》中的方言点一般一个县份选一个方言代表点,在方言复杂的县份选多于一个的代表点。以前分成“土语—次方言—方言”3级。

它把汉语方言分成10个大区:官话、晋语、吴语、徽语、赣语、湘语、闽语、粤语、平话、客家话。早期分区没有晋语、徽语、平话,只有7大方言。其中官话大区分成8个小区:东北官话、北京官话、冀鲁官话、胶辽官话、中原官话、兰银官话、西南官话、江淮官话。闽语大区分成7个小区:闽南、莆仙、闽东、闽北、闽中、邵将、琼文。江淮官话的范围比原来的“下江官话”范围扩大,包括湖北的黄冈、孝感和江西的九江、瑞昌等。把晋语从原来的官话中分立出来,因为有人声声调,接近江淮官话。把徽语从原来的吴语里划分出来,因为这里的方言既有吴语的特征,又有江淮官话特点。把赣语和客家话从原来的客赣方言里分开,因为部分古代浊音声母上声语素客家话现在读阴平,赣语多数方言没有这个特点,一些常用的古代全浊声母语素客家话读

不送气清音,赣语仍然读送气清音。确立平话方言的独立分区地位,因为古代的全浊声母语素现在读塞音、塞擦音的时候,一般都是不送气清音,跟广西其他方言不同,但是跟湘语有一些接近。

它对方言区域的划分,抓住了两个重要的标准:一个是古代入声的演变;一个是古代浊音声母的演变。按照古代入声的演变标准,可以把官话和非官话分开,官话方言绝大多数地点古代入声现在都没有单独形成一个声调,而是合并到非入声声调里了。根据古代清音声母入声的归属演变,又可以把官话大区分成8个小区。按照古代浊音声母的演变等标准,可以划分9个非官话方言。

具体到各个方言区域的主要特点是:

官话大区:除了江淮官话和其他官话的零星地点外,官话方言没有入声,古代入声现在跟非入声声调合并。

东北官话:古代入声清音声母语素现在读上声的比北京多。

北京官话:古代入声清音声母语素现在分别归属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分散归属。

冀鲁官话:古代入声清音声母语素现在多数读阴平。

中原官话:古代入声清音声母和次浊声母语素现在读阴平。

西南官话:大多数地方古代入声语素不论清浊都读阳平。

胶辽官话:古代入声清音声母语素现在多数读上声。

兰银官话:古代入声清音声母语素现在读去声。

江淮官话:古代入声语素现在保留入声。

晋语:古代入声语素现在保留入声,在这个特点上接近江淮官话。

赣语:古代全浊声母语素现在读塞音和塞擦音的时候,不论平仄都读送气清音;古代次浊声母上声语素一般不像客家话读阴平。

客家话:古代全浊声母语素现在读塞音和塞擦音的时候,现在读送气清音,但是一些口语常用语素(例如“渠、笨”)往往读不送气清音;部分古代全浊声母上声语素现在读阴平。

徽语:古代全浊声母语素现在读塞音、塞擦音的时候,现在大多数读送气清音,少数读不送气清音。这个特点接近客家话。

粤语:古代全浊声母语素现在读塞音和塞擦音的时候,多数地点遇到阳平、阳上读送气清音,遇到阳去、阳入读不送气清音。

吴语:古代全浊声母语素现在一般读不送气浊音声母。

湘语:古代全浊声母语素现在读塞音和塞擦音的时候,老派一般跟吴语接近,读不送气浊音,新派不论平仄都读不送气清音。

平话:古代全浊声母语素现在读塞音和塞擦音的时候,一般都是不送气清音,在这个特点上接近湘语。

闽语:古代全浊声母语素现在读塞音和塞擦音的时候,现在多数读不送气清音,少数读送气清音。

根据上面描述,我们可以根据古代全浊声母语素现在读塞音和塞擦音的时候是否送气,给 10 个大方言分层次分类:

(A)官话(晋语)——平声送气类型方言。古代全浊声母语素现在读塞音和塞擦音的时候,遇到平声送气,遇到仄声不送气,全部清音化。

(A1)典型官话。典型官话没有独立的入声声调了。包括广大官话大区方言的大部分。

(A2)非典型官话。包括官话大区中的江淮官话和其他官话的零星地点,还有晋语。

(B)非官话——整齐送气或者不送气类型的方言。古代全浊声母语素现在读塞音和塞擦音的时候,要么遇到像官话但是上声跟平声合流;要么基本上都送气或者都不送气。

(B1)赣语、客家话、徽语、粤语方言——整体送气类型方言。古代全浊声母语素现在读塞音和塞擦音的时候,几乎一律读送气清音声母,而且一般都已经像官话一样全部清音化。其中粤语读不送气声母的比较多,而且像官话一样根据声调不同分流,但是由于阳上也读送气,所以跟官话相比,送气占有主流地位。

(B2)吴语、湘语、平话、闽语方言——整体不送气类型方言。古代全浊声母语素现在读塞音和塞擦音的时候,几乎一律读不送气声母。其中闽语读送气声母的特殊例子多一些,同时率先全部清音化。湘语在清音化的过程中,有的读清音,有的还读浊音。吴语清音化的速度最慢。平话接近湘语,也可以说是湘语广西的变体。

根据陈立中(2004)研究,在湖南、湖北、江西 3 个省交界的区域,存在一条连通湘语和吴语历史渊源的方言走廊。这里面对湖北官话和江西赣语的包围,坚守有典型吴语、湘语特点的方言阵地,是吴语和湘语形成藕断丝连的局面。

(B3)混合类型的方言——整体送气同时读浊音甚至浊音反常。这种类型的方言不是成片分布,出现在比较偏僻的地域。例如,湖南新化因为地处偏僻的雪峰山东南脚,古代全浊声母既保留赣语一律送气的特点,又具有周围老湘语读浊音的特点。这说明,越偏僻,从江西来的移民越能够保持赣语的特点。在湖南东北角,跟赣语区域交界的岳阳县城方言,这种读浊音的

特点,甚至反常地同化到古代次清声母。

这是老湘语在浊音特点上对赣语过度同化的结果。由于本来是赣语,按照赣语的送气特点导致古代次清和全浊声母现代都送气,形成送气特点一致的同盟。又因为来到了湘语区域,受到湘语影响,要改读浊音,所以这个同盟一起读浊音。这样本来从古代到现代的方言都不读浊音的古代次清声母,也跟着古代全浊声母,反常地读了浊音。

根据陈立中(2004)研究,在江西北部,跟湖南东北、湖北东南交界的区域,存在一条连通湘语和吴语历史渊源的方言走廊。这里除了出现有典型吴语、湘语特点的方言,还出现赣语,特别是出现岳阳县城这样杂交混合的反常方言。

2.2 汉语方言特征地图

曹志耘主编《汉语方言地图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是第一部在统一实地调查的基础上编写的、全面反映20世纪汉语方言基本面貌的原创性语言特征地图集。这个成果由国内外34所高校和研究单位,57名研究人员,历时7年完成。他们实地调查全国930个地点,编写收录510幅方言地图。具体情况参看1.3节。

2.3 方言词的确认和方言词典

理论上,方言跟共同语一样是独立的系统,它不会有跟共同语完全一样的词,哪怕只是一点语音上的差别,何况任何一个看起来相同的词在用法上多少有不同。有些方言词甚至找不到恰当的普通话的词去翻译。

例如普通话的“尝试”在湖南衡山方言中也有。看汉字的书写毫无不同。可是在衡山方言中不仅声音听起来像普通话的“详细”,而且用法跟普通话的“尝试”很不同。普通话的“尝试”在衡山话中用单音词“试”表达;衡山方言的“尝试”表示“炫耀地诱惑”的意思,例如“他一有好吃的,就~别个。”

“出奇”在普通话中表示“特别”的意思,《现代汉语词典》虽然标注成“形容词”,但是只能做定语、补语和状语。“出奇”在衡山方言中却只能做谓语或者谓语中心,意义是贬义的“有什么了不起”,例如“~,我怕冒看过哦!”